

读过白先勇的小说,仿佛穿越时空看一场有声有色的老电影,像是一下子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繁华似锦的上海滩,百乐门、大世界里歌舞升平,听咿咿呀呀的吴侬唱腔,看觥筹交错的酒池肉林,数不尽的金银珠宝、如花美眷,最终都如同过眼云烟,正应了《游园惊梦》里这片唱词: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……”

最后的贵族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



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

已故著名导演谢晋曾用“最后的贵族”来形容台湾作家白先勇。这位家世显赫——父亲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,母亲为桂林富贾之女的著名作者在文坛也算得个异类;他 23 岁成名,并非多产作家,因短篇小说集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、《台北人》、《纽约客》

和长篇小说《孽子》享誉中外。白先勇的代表作多以官宦之家的兴衰史为主线,以新旧时代交替的人情世相,书写下中国人的失落感和历史沧桑。近年来,白先勇转向我国古典地方戏曲——昆曲的保护和传承,并于 2004 年在大陆出版新作《姹紫嫣红牡丹亭》。

父亲与民国

过去的 10 年间,白先勇的大部分精力被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占据,他为父亲白崇禧写的传记,只能在奔波的间隙进行。

2011 年底,《牡丹亭》演满 200 场,正式封箱。他觉得是时候从经营了 20 年的昆曲中抽身回来,好好写写父亲了。

白先勇对记者说自己多年来就想为父亲写一本传记,但却始终没有动手。多年来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寻回父亲白崇禧的蛛丝马迹,试图拼凑出这位将领的戎马一生。

传记写完之前,他先搜集了数百张照片,翻找资料,推敲图注,集结成上下两册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白先勇带着两册“身影集”,先后走过北京、武汉、桂林、广州、上海,以及台湾——他父亲“战斗过的地方”,他希望通过展示这些照片,揭示被遮蔽的,澄清被误解的。

而关于父亲的书终于在去年完成,书名不叫《白崇禧传》,而叫《父亲与民国》。

这 10 年的写作是艰辛的,如同对父亲传奇一生进行回溯。他找了各种关于父亲的史料——台儿庄大捷、淮海战役、“二二八”事件——白崇禧一生的诸多事情,不管在海峡这边还是在海峡那边,都像是罩着一团雾,要么“这边也不讲,那边也不讲”,要么“讲得不深”。又有很多事情,当事人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,“乱讲”。

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有一幅名为《广西三杰》的作品,画面上是白崇禧、李宗仁 and 黄旭初三人骑在战马上,迎风而立。白先勇解释说当时正是北伐之后,父亲全力治理广西时期。“父亲把”广西治理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,许多外省知识分子来了。徐悲鸿就在广西。”当时“九一八”已发生,白崇禧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,所以以在广西提出了“全省皆兵”的口号。

白崇禧回忆说:“当时学生、军人统统受军训。后来广西果然出兵出得最快。以人口比例来说,军队的比例也是最高的。准备抗日的时候徐悲鸿画了这幅画,他对几个军事领袖也有崇敬。徐悲鸿会画马,这马画得出色,父亲的神态也很好。”

台儿庄战役之后,白崇禧一夜之间从蒋桂战争时期的叛将变成了英雄,当时著名的《良友》画报 1938 年 5 月号将白崇禧作为封面人物,4 月号的封面是李宗仁。“本来《良

友》杂志的封面以前都是美女,这两期是两位将军,这说明当时那一仗对当时影响很大。”广西电影制片厂的《血战台儿庄》白先勇表示自己也认真地看了很多遍,并评价说拍得非常好、非常客观。“李宗仁选得一模一样,可父亲一点都不像。这个有点遗憾。”

而关于白崇禧与蒋介石那段公案,白先勇讲:“我父亲和蒋中正瑜亮情结。”

白先勇说父亲并非被蒋介石“骗”到台湾,而是“为‘国’赴台”。在最后十几年里,他身居虚位,和情治人员日夜相伴。“15429”的车牌号一直伴随他走到了 72 岁生命的尽头。

白崇禧死后,一个源自国民党退休特务谷正文的说法——“白崇禧被蒋介石派女特务毒死”——几乎举世皆知。白先勇对此回应:“胡说。”他拿出蒋介石悼唁父亲的视频,说:“蒋介石那时满脸哀戚,真要是他毒死的,那也演得太像了吧?”

当然,并非每个人都能同意的看法。白先勇说自己并没有“避尊者讳”、刻意拔高。在讲述白崇禧的时候,他不单是一个写作者,也是一个父亲的儿子。

“在这种情形之下,我写了父亲的传,至少在军事层面也反映了民国的那一段很重要的历史。想了很久时间,我想这个题目是可以的,合适的,《父亲与民国》。既是写我父亲的传,也是写民国的那一段历史。”

最敏感的伤心人

台湾作家余光中对白先勇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述:“他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,他的作品最具历史感。”

读白先勇的小说,仿佛穿越时空看一场有声有色的老电影,像是一下子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繁华似锦的上海滩,百乐门、大世界里歌舞升平,听咿咿呀呀的吴侬唱腔,看觥筹交错的酒池肉林,数不尽的金银珠宝、如花美眷,最终都如同过眼云烟,正应了《游园惊梦》里这段唱词:
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。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,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,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。”

这场景事,纠缠着白先勇一生的记忆。抗日期间,愁云惨雾的重庆,才七八岁的“白家五少”白先勇染上肺病,得了“童子癆”后被隔离在山顶上一幢小房子里,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。“一个春天的傍晚,园中百花怒放,父母在园中设宴,一时宾客云集,笑语四溢。我在山坡的小屋里,悄悄掀开窗帘,窥见园中大千世界,一片繁华,自己的哥姊,堂表弟兄,也穿插其间,个个喜气洋洋。一霎时,一阵被人摒弃,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,禁不住痛哭起来。”(《蓦然回首》)

抗战胜利后搬到繁荣的上海,“我从没看过那么多霓虹灯!别看我是个八九岁的小鬼,最好奇了,眼睛到处看,所以老上海的东西都看在眼里。”

大世界、百乐门、大光明影院……十里洋场斑斓印心头,白先勇最爱“一代妖姬”白光,在他看来,这是“结合北地胭脂跟南国佳丽”的美。

出身名门,白先勇经历了从世间浮华到生活萧索,生活的百态凄凉让这个一出生便被寄予希望的“将门之后”倍感压力,而当一切归于落寞时,白先勇却只能将这巨大的落差埋藏在内心世界中,并为他日后作品中的强烈悲剧倾向埋下伏笔。

《孽子》就是这样——一个白先勇情感的乌托邦,这部 20 万字的小说是他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。

在这个被设定发生于“民国 60 年”的故事里,当出身将门的“龙子”遇见名角“阿凤”后,一段感情纠葛很快如电光石火般闪现,少年们便按照自己对生命与爱情的理解构筑他们的王国,而世俗道德礼仪被暂时搁置——尽管若干年后,龙子亲自将阿凤刺死,但这犹不失为一段唯美的感情。

1983 年,《孽子》由台湾远景公司出版,这本“怪书”让大家慌了手脚,不知该如何面对。初期的沉默之后有一些零星言论,但白先勇说“但都没有真正讲中题义”。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,深入评价《孽子》的评论才渐渐多起来。人们对待《孽子》态度的转变,其真正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同志议题的态度转变。2011 年《孽子》在大陆出版,遭遇几乎和 80 年代的台湾一样。

“我觉得人很奇怪,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?为什么都要每个人都一样?”

在《孽子》中,龙子因为刺死阿凤犯下重罪,被送往美国避难——而身为国民党五上将之子的白先勇,也于大学毕业后即被送往美国,巧合之外,不禁令人感慨作者笔下某种命运的冥合。

王国祥则是白先勇相守了 38 年的挚友。与“阿凤”所不同的是,在王国祥因“再生不良性贫血”而饱受病痛折磨的最后 3 年里,白先勇始终陪伴在他的身旁,并传为一段佳话。王国祥离世后白先勇曾说,王国祥是他的恋人,但是二人之间不完全是恋人之情或手足之情这样简单的定义,应该说“他是我一生的生死之交”。

Opinion 记者眼

施一公:外籍院士

因为“院士”,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再次成为媒体焦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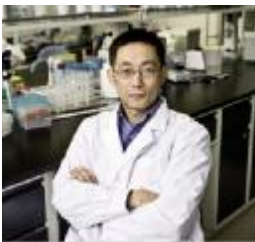
2013 年 4 月 25 日,施一公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,4 月 30 日又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。

这两则新闻引起热议的原因很简单:它很容易令人联想到 2011 年施一公落选中科院院士。部分支持施一公当选中科院院士的人认为: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职位而归国的施一公,理应获评“杰青、长江学者、千人或院士”,才能显示相关机构对归国学者的重视。

但是,用这种“非黑即白”视角看待国内学术评价体系,是否“官本位”思想太过浓郁了?毕竟,对多数科研工作来说,称号、职位并非评价学术成就与科研贡献的唯一标准。

翻看近几年关于施一公的报道,会发现这位谨言慎行的“海归派”极少接受采访,相关报道也多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。相比名利,他更的是关心中国科学在世界上的水平与地位。

而对于“院士”头衔,套用一句他本人曾说过的话:“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,未免太狭隘了。”



李兰娟:决意巾帼

4 月 27 日,著名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网站刊发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等人的论文《人类感染活禽市场来源的新发 H7N9 亚型禽流感病毒:临床分析和病毒基因组特征》,该研究成果首次公布了一例感染患者和一例受感染禽类分离出的 H7N9 病毒株的全序列基因。

部分不明其中科学原理的媒体一度据此认为 H7N9 将很快人传人,但李兰娟在第一时间便出面澄清,社会疑虑由此很快被打消。

只要对 H7N9 暴发以来的新闻稍加回顾,就会发现李兰娟这个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天的报道中。这位 66 岁的院士总在第一时间澄清传闻、通报进展。而在采访之外,她还要指导团队继续相关科研工作,密切监控 H7N9 病毒基因,压力可谓不大。

作为曾经历非典的众多中国科学家之一,再征“沙场”的李兰娟正用行动告诉我们:枕戈待旦,百战不殆,才尽显中国科学家风范与决意。

但在面对公众关于 H7N9 的焦虑时,她却微笑着对着镜头说:“给我一份鸡肉饭。”



莫言:“忘掉诺奖”

获得诺奖之后,莫言的社会活动更多了。

4 月 27 日受聘成为山东大学首位讲座教授,两天后他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作品《刺荆》上演。在此前接受采访时,莫言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打破“作家获诺奖后再无佳作”的诺奖“魔咒”。

“获诺奖半年多,我感觉很多的议论和激情越来越跟我没有关系。”在山东大学他的首堂公开课上,莫言的开场白有些直白,略带些许深刻。之后,他表示将要“坐在书桌前写作时,忘掉自己已获得诺奖这件事,一穷二白去写作”。

在笔者看来,莫言能否忘掉诺奖倒是其次,关键是国人能否“忘掉”诺奖——在评判一位作家时,能否在摘掉他既有的光环后,对作品本身作出公正、客观的评价。从这一点上说,该原则适用于中国的各个领域。

58 岁的莫言正在努力忘掉诺奖,以期“重新回归内心自由,继续给世人讲故事”,那么我们呢?

朱令:尴尬司法?

近日,“复旦投毒案”,勾起了人们关于 19 年前清华女生朱令遭投毒案的回忆。

近日,针对这一案件,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微博转发并评论:《羊城晚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亦重新采访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庭;陈坤、姚晨等明星则纷纷慷慨解囊。

有媒体据此调侃,热心的“观众”们尴尬了司法。在百度朱令吧、天涯论坛等网络舆论空间里,关于案情的讨论声一浪高过一浪,人人争做福尔摩斯。在这里,假如你没有自己的判断,很可能就被这股情感洪流所左右。

人们的讨论集中于:在网络舆论给出了众多符合民众心理预设的“证据”之后,为何司法机关为什么没能给出令人“满意的答复”——重审案件?

有人说,近日破获的复旦投毒案是“网络舆论尤其是微博平台的胜利”。笔者认为这并不尽然,线索明朗、侦查工作到位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及时认罪才是案情得以破获的根本。

反观朱令案,相信亦是如此。



(吴益超)



白先勇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表演现场